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 经济学研究

□ 金 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一、“高质量”的经济学性质

将“高质量”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达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挑战。在现代经济学的学术主体框架中,“质量”基本上是一个被“抽象”掉的因素,一般将其归之于“假定不变”的因素中,或者以价格来替代之,即假定较高价格产品的质量高于较低价格产品的质量,即所谓“优质优价”,可以称之为“质—价”对称性假定。但是,如果质量因素体现在生产效率或规模效益上,即发生工业化生产中普遍的“物美价廉”或“优质平价”现象,特别是当大规模生产和供应导致“大众消费”时,如何判断和分析经济活动及产品质量的经济学性质,往往成为理论经济学尽可能回避的问题。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自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推向理论高峰后,经济学知难而退,关于商品二重性的理论路线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向一元化方向并轨,即走向了将商品使用价值并入交换价值的路线,而且倾向于以供求关系分析完全取代价值理论。

经济学家们当然不是不知道,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即获得有用产品,而所谓“有用产品”实际上包含着强烈的具象性质量特性。但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并非就一定是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人类社会必然走向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产品成为商品,即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这样,各个生产者的生产目的就从为自己提供使用价值,转变为以向别人提供使用价值为代价,而获得对方提供给己方的使用价值。此时,

产品使用价值所体现的质量合意性,就从关注自己消费的产品的质量合意性,变为关注交换对方能否认可和接受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生产者的“自利”动机就不是产品对自己有用,而是可以获得别人提供的交换物的有用性。这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质量关注性的具有关键意义的关系“反转”现象,即由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产生了交换价值,并开始取代使用价值的地位。而当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全权代表时,使用价值就日益落入弱势地位。而使用价值之根——质量——也就退居次位,甚至被严重忽视。经济学一方面要尽可能“抽象掉”使用价值因素,另一方面又不可无视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必须要留在经济学家心中,但经济学对如何处理使用价值又无从下手。如果引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经济学会显得很“笨拙”,不精确;而如果无视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经济学就如同丢掉了自己的根基。这是经济学自始至终的一个“命门”性难题。

因此,研究高质量发展问题,有必要再回到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那里,看看这一问题的理论根基究竟是怎样的。关于商品价值理论的研究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一直基于二重性的方法论,即认定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两者的关注都不可偏废。在经济活动的本真意义上,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归根结底当然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这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常识性事实。而随着真实需要的不断提升和生产能力的相应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性能也不断提升,这也是经济活动的原初本真性。在这个根

本问题上,马克思始终保持学术定力,将商品二重性理论置于经济学逻辑基底,并始终坚持,使之成为贯彻和决定整个学术体系的“基因”。按照他的逻辑,交换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发展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时,商品的二重性就显著对立了,而且形成独立的供需双方:提供有用产品的一方为供给方,付出货币的一方为需求方。供给方的直接目的是获得代表交换价值量的货币,而需求方的直接目的则是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有用产品。而且,参与交换的主体都会递次居于供方和需方的地位,以达成获取使用价值的最终目的。这就是马克思以符号形式 $W-G-W$ 所定义的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和简单商品经济。此时,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关注方虽然发生了反转,但双方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获得使用价值。而进一步的实质性变化是,从简单商品交换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再次反转,即成为 $G-W-G'$ 。此时,交换的目的不再是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即货币的增殖。此时,商品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重要性“退居二线”并间接化了,即只是在能够有助于或者不妨碍交换经济即货币量增殖的前提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才是重要的。极而言之,如果有可能采取完全不涉及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即实现货币量增殖,那不是更好吗?货币如果能够自行增殖,岂不是求之不得的“高招”和“捷径”!这就是所谓“虚拟经济”的逻辑。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原本意义上,使用价值是生产目的,交换价值即货币是手段,而现在却反转为:使用价值及其质量不过是手段,获得更多交换价值即货币才是目的。如果能够不要(或省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这个手段或工具,也能达到货币增殖的目的,那么,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就完全可以被“忽略”了。

当然,在此情形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也并非完全无关紧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归根结底是由实体经济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是竞争性的,只有当产品的质量能够满足真实需要,才会有更多买家;只有当买方愿意购买时,卖方才可能获得货币,即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一情况可以称为交换对质量的合意性要求,即必须能够满足购买者对于使用价值质量的需要,否则使用价值就发挥不了获取交换价值的功能。更重要的是,通常情况下,生产和提供产品的供给者众多,卖方的产品交换价值要得以实现,必须要有更具优势的性价比,才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完成交易过程,这可以称为质量的竞争力,即同竞争对手相比较的质量优势。很显然,质量合意性决定质量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决定产品的价值实现。

从关于商品质量的上述含义来看,所谓商品质量首先当然关系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一般来说物质技术性能越高,产品质量也越高,其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也越强。但经济学所定义或关注的商品质量也绝不仅仅关系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在经济学意义上,产品质量是相对于满足人的实际需要而言的,如果没有人的实际需要,就无所谓产品质量。

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而在竞争性领域,所谓质量,同时还指具有更高性价比因而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性。需要强调的是,所谓“需要”是很复杂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也是不断增进变化的。所以,当将这一理解推演到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时,就赋予其很强的动态性,在其基本的经济学意义上可以表述为:高质量发展是指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

二、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含义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高速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其本质含义首先都是社会所生产和消费的有用产品的增加,也就是说,其经济学含义都是使用价值量的增加,更多的使用价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交换价值并无使用价值,从根本上说不是理性追求的目的,而只是获得使用价值的手段或工具。但是,由于各种不同产品的使用价值难以进行一致性计量和加总,所以经济学研究中不得不以货币作为一致性计量的核算单位。从技术上说,进行这样的替代,是假定产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具有量的正相关性,所以,交换价值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使用价值量(可以称之为“量—质对称”)。当然,由于真正想要计量的是使用价值量而不是交换价值量,所以,核算统计中往往采用的是“不变价格”以至“购买力平价”这类非现价统计指标,以尽可能剔除交换价值变动(名义价格变动)或国际差异(各国货币实际购买力因货币汇率而发生的偏差)所导致的对使用价值真实量的计量偏差。

除了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增长的上述本质相关性之外,两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在高速增长阶段,一方面,主要专注的是经济产出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不足。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发挥了强劲的力量,表现为经济关系中的工具性目标,收入、利润、GDP等,成为社会追求的最重要目标。在这一发展阶段,整个国家表现为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倾向,而且对物质成就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具有或趋向于对货币的强烈欲望。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现代经济的货币体系以信用货币为主体,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往往蜕变为非理性地追

求货币数字的疯狂游戏,导致产生所谓“非理性繁荣”和“泡沫”现象。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那毕竟是一个取得了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的时代,整个社会和国家由此而实实在在地进步了,富裕了,强盛了。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度扩张,GDP从占世界不足5%,迅速提升为15%以上,并且将继续增长,按(以汇率计算的)GDP总量衡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毫无悬念地将在不长的时期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度过了这个令人兴奋的高速度增长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后,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并日益显现出来。十多年前,人们就开始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简言之,当经济增长的量的不足即“落后”问题基本解决后,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凸显出来。而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真实经济的结构上。所谓经济结构,从经济理论上讲,实际上就是产品及其生产过程的使用价值层面,即供给侧现象。当然,需求侧也有结构性问题,而真实需求的结构问题实际上也是与使用价值相关的现象,即对质量的要求。

因此,从市场经济的商品二重性角度观察,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运行的目标和动力机制从主要侧重于以交换经济(货币单位)计算的产品总量增加,转向更加注重产品 and 经济活动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合意性。当然,这也绝不是说,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交换价值就不重要了。以交换价值所体现的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机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还将发挥重要作用。收入、利润、财富、GDP等仍然是重要指标,关系到经济是否或能否有效运行并取得进步。但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面即供给侧的关注,将变得尤为重要,受到更大关切。

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质态

进入新时代,经济质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学性质具有了显著的新特征。正因为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生产活动是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者是为向他人提供使用价值而进行劳动,其目的是获得更多的交换价值(货币),而交换价值(货币)本身并不具有使用价值,所以这样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生产活动目的与手段的角色反转。当人类社会进入一定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必会凸显其最终的决定性,即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实现本真复兴。根本上说就是“享用”的崛起,是“享用”对于

“交换”的“平权运动”。在这一意义上,即从经济学的价值论上说,新时代是本真理性渐居主导地位的时代(或本真复兴的时代),必有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以适应和体现时代质态的演变趋势。经济发展的本真理性实质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量目标为动机。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质态的变化,发展的质量要求也会改变(提高),高质量发展所涉及的基本因素与以往时代也不尽相同,即发展的政策目标以及各目标的优先次序将有很大改变。基于过去的社会经济质态或发展阶段,当时主要强调“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所定义的商品二重性中,强调了交换价值(索取权),而使用价值(享用性)反而成了获得交换价值的手段。尽管市场经济确实是交换经济,但这一性质并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归根到底也是满足人民实质需要的经济制度,而且市场经济的前一个性质最终是受上述第二个性质决定的(创造使用价值满足真实需要)。正因为上述前一个性质可以成为实现后一个性质最有效的手段,市场经济才是人类发展中最具效率和最现实可行的经济制度,即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满足人的真实需要最有效的制度。在市场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劲主导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上述第二个性质被抑制了。而进入新时代,市场经济的这个最终服从于满足人民实质需要的根本性质将越来越显著地显现出来。

因此,新发展观,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成为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而且,新时代的这些要求的实现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运行必须是效率和质量导向的,即体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转变,也是一个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必须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新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机制才能得以实现。

第一,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市场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其基础性的体制机制要求是,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所以,整个经济系统的价格体系的合理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这里所说的价格,不仅包括产品价格、服务价格,而且包括要素价格,即工资、利率、汇率等。而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取决于市场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在现实中,市场体系中存在各种

类型的微观经济主体:私有和国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大型和中小型、本国和外国、单元性和网络性、实体性和金融性、自然人和法人、特许经营和自由经营,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微观经济主体具有不同的市场势力,相互间往往是很不对等的。因此,合理的价格体系和有效的价格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和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取决于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只有当产权边界明确、产权安全可靠、产权权能有效、产权交易便利,价格机制才能有效发挥调节经济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说,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保障。促进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尽可能“放开价格”,而且需要构建各领域特别是特殊领域的有效交易制度。

以上两点表明,进入新时代,不仅没有否定市场经济关系,而且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形成并更加依赖于更高质量即更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交换性所要求的权属性生产和消费将更为有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享用性将提升到更高水平,享用的范围从个体权属,扩大到群体共享性(公共服务)、环境质量(生态环境保护),以至体现享用的包容性和平等性的更广泛领域。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个体(私人)权属性与公共权属性的结合和协调。总之,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加有效的市场体制机制,更好体现市场经济的交换性和享用性的高度协调。

第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新时代生产和消费质量水平的提高,对公共权属性机制以及非权属性享用的保障(例如良好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政府必须在对市场的治理规制、进行重大规划特别是区域规划、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收入分配、构建社会安全网和援助弱势群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这些方面也都直接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和治理手段。

第四,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因,只有创新驱动的经济才能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学上说,创新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技术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产业或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首先要有新技术的来源,这可以是外源性的(例如引进、模仿),也可以是内源性的(例如自主研发、边干边学)。如果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结合。当然由于分析研究的需要,可以将创新的技术类型划

分为外源主导的技术和内源主导的技术两种典型类别。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对科技资源和成果的要求越来越强,能够多方面多渠道获得高新技术资源,使之成为本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活水源头,就成为一个关系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在新发展观中,“开放”的含义绝不仅仅是指国际贸易和投资,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开放性。实际上就是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同产业技术创新及企业研发和新产品产业化,各环节相互联通形成合作机制,即要以有效的体制机制来保障和促进科研成果的产生和产业化。总之,高质量的发展必须更好解决企业的高新技术“源头活水”问题。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要务。

五、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特征

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是一个社会行为方向的巨大转变,而且要有思维方式的适应性改变和引领性革新。当进入新时代,转向高质量发展方向,也可以研发一套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核算指标,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及效率、质量、结构、安全、可持续等因素进行科学量化和指标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状况和成就的显示性指标。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非常丰富的因素,多维性是其基本特征,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质量的含义也必将不断变化,因为作为发展质量根本性质的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和变化的,但在理论上,还是可以对现阶段的发展质量评价因素进行量化归纳和指标体系构建,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评价工具。

当然,即使高质量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量化指标评估,但其实质同高速增长显示性指标是不同的,人们对其的关切性也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以关注总量为主,前者主要是关注结构即各个分量及其相互关系。从经济学基本理论看,后者是假定交换价值(货币单位)核算量替代使用价值实际量,并假定两者高度正相关。而前者却是一个多重因素复合的指数化数值,其中含有本质上难以量化的因素,因而任何量化表达都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相当程度的偏差。这一差别恰恰反映了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性差异,也反映了高速增长阶段与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同的时代特征和经济发展质态。由于高速增长阶段方向主要是经济总量扩张,更强调的是工具性价值;高质量发展阶段方向主要是结构升级和系统优化,更强调的是本真性价值,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前者往往表现为“锦标赛”似的竞争状态,你追我赶,快者胜;而后者却更需要“细工慢活”似的久久为功,稳中求进,恒优者强。人们

对前者成就的感受更具有可直接计量性,例如,产出增加、收入提高、利润丰厚等;而对后者成就的感受更具有权衡评估性,例如生活质量、环境质量、主观幸福等。

高质量发展要求区域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多样性。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突飞猛进”,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稳中求进”;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鼓励先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人民共享”;高速增长阶段的关切主要表现为“GDP居首”,高质量发展更关切“绿色环保”。基于这样的变化,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态势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发展质量评价的一定模糊性,反映了发展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并且其关切重点从物质成就表象层面逐渐深入内在实质及体验感受上(外国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这决定了各个地区的发展可以有多种路径选择,致力于发挥比较优势,创造各具特色的高质量表现。尽管对于高质量发展,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可持续的增长是必要的,而且是基础性的,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优化目标则可以是“各显神通”、“各具特色”的。由于不同的区位、资源和历史条件,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规模必然会有差别,“高增长”和巨大经济规模(生产规模)并非所有地区都可能达到的目标。但是,各地区特色可以成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经济腹地的发展质量未必不如增长极中心地区,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经济密度较低)地区的发展质量未必不如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各具特色的多样性的区域格局和经济文化特色,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为形成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and 路径,提供了各色条件和很大选择空间。高质量发展要求多样性,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基于发挥差异化优势,中国的巨大经济体正具有这样的特殊优越条件,各地区都有发展方向的很大战略选择空间,非常有利于支持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

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

六、以全面性战略和现代化治理体系 引领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就是多维性,表现在战略方向上就是政策目标多元性。因此,同高速增长阶段的战略思维不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维突出体现为全面性,许多重要举措往往要求

“全覆盖”。而在政策目标多元化前提下,实现战略方向全面性,就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这一要求在现实中也往往成为难点所在,因为多个目标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当然,战略方向全面性,也绝不是没有主攻目标,不分轻重缓急。恰恰相反,战略方向全面性的实现,必须通过一定时期的主攻目标的按期达成来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强烈反腐败行动和正在进行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以及以遵守“八项规定”为重点的党政廉洁建设等,都是向着高质量发展转变所做的极大努力。就像高质量的生活体现为清洁卫生一样,高质量发展,当然必须体现为经济社会以至政治领域的“高清洁度”:生产清洁、环境清洁、政纪清洁、营商关系清洁、社会风气清洁。

与“清洁”同样重要的是“安全”。高质量的发展当然必须体现为更具安全性的发展,国家必须有将经济和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因风险失控而爆发危机。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是权衡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没有自由就没有高质量的发展,而如果失去安全则一切发展成果都会化为乌有。所以,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安排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要实现“宽松”与“管控”相协调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可见,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社会质态,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公平正义,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公平促进效率,以高效率实现包容性发展,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如果失去公平正义,就根本谈不上发展质量,可以说,公平正义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底线,包容性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本质特征之一。

发展质量的高低,最终是以经济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则的,而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性要求,而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高质量的发展必须体现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满足上,并且人们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日益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人的能力也越向全面化发展。高质量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需要和要求。既然人及其能力的发展是趋向于全面和充分的,那么,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是一项覆盖社会全领域的伟大事业,而且是一个永远难以尽善尽美的永久持续过程。人民的一些需要满足了,又必然有新的更高的需要产生,永远不会达到完全满足的终点,因此,必须有更高质量的发展,而这也正是高质量发展永无止境的动因。

■ 《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约21000字